

Y-37/2

鹤岗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鹤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二日

目 录

医大搬迁鹤岗前后·····	薛公绰 (1)
忆打断传染环境卫生战略	
——消灭东北鼠疫大流行的卫生公务·····	王 斌 (4)
解放战争中的鹤岗	
煤矿运输工人·····	张 钺 (7)
我在兴山参加剿匪的回忆·····	张 萍 (16)
艰苦奋斗的一九四二年·····	张 宏 (27)
我参加的通信情报站·····	张 宏 (32)
对兴山四坑恢复生产的回忆·····	罗良强 (36)
回顾《新鹤岗报》·····	杨树森 (46)
一位工人出身的好矿长·····	孙好清 郭相忠 (62)
鹤岗的第一所中学·····	杨永泰 (73)
文克银队长和我们的公安队·····	宫宝泉口述 (77)
	赵玉书整理
教育坑的诞生·····	郭相忠 (87)
鹤岗市医药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韩志平 (90)
烈士英灵千古 人民永远怀念·····	陈明德 (100)
居鹤琐忆·····	文 实 (102)
电影团从延安到兴山	
——当年日记选摘·····	向 异 (114)
我在东影十个月·····	钟敬之 (118)
从东征到南下·····	吴本立 (123)

我拍《民主东北》的经历……………李光惠(133)

最初木偶……………(日本)持永只仁(140)

明伟译

东影修理科印象记……………(日本)尾野达男(149)

古泉译

忆东影，最忆是兴山……………孟广钧(153)

回忆我在东影的三年……………罗 光(158)

医大搬迁鹤岗前后

薛公绰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与穆迪生同志（曾任长春市卫生局长，已故）奉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同志之命，从哈尔滨到佳木斯，为总卫生部和医科大学寻找合适地址。我们先到佳木斯。当时由于日军投降前实施的焦土政策，佳市的大部分房屋已被毁坏，如不大修，很难使用。我们听说富锦有些房子，又到富锦去了一趟。富锦是个小县城，公房很少，容纳不下总卫生部和医科大学这样上千人的单位。而且那儿又不通火车，交通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决定不予考虑。回佳木斯后，我们又找合江省政府。他们介绍说鹤岗矿务局房屋较多，且有医院，现在生产尚未完全恢复，你们可以去看看，和他们商量借一部分房屋。我们从莲江口搭乘煤车去鹤岗。到鹤岗后，受到当时鹤岗矿务局局长兼兴山市（即现鹤岗市）市长李天放同志的热情接待，并在他亲自陪同下看了一圈。我们看到矿务局原日本职员住宅房大部分空着，损坏不重，稍加修理即可做为医大教职员宿舍，矿务局办公大楼也空着，可当教学楼；原日本单身职员宿舍可做为学生宿舍；矿务局医院也大部分空着，可做为医大附属医院。看完后我们即回哈尔滨向贺诚部长、孙仪之副部长汇报。他们当即决定将总卫生部一分为二：前方仍留在哈尔滨，后方搬到佳木斯，东北军医大学（该校是我军接管伪满军医学校后改组而成的，原属松江军区，现改由总卫生部直接领导）全部

迁往鹤岗。并决定李亭植同志（已故）和我先带少数同志到鹤岗打前站。七月份，东北军医大学全部迁到鹤岗。总卫生部任命陈述同志为校长，李宽和同志（他带着原通化医学院部分师生数十人经佳木斯到鹤岗，与东北军医大学合并）为政委，李亭植同志为副校长，我为教育长，崔秀汉同志（原哈尔滨医大药理学教授）为教务主任。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筹备，东北军医大学于八月初正式开课。八月下旬，由王斌、阙森华（已故）二位同志率领的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师生百余人，从张家口经齐齐哈尔、哈尔滨到达鹤岗。总卫生部决定东北军医大学与中国医科大学合并。并任命王斌同志为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兼政委，李亭植同志为副校长，我为教育长，阙森华同志为政治处主任，陈应谦同志为医大附属医院院长，高浩之同志（已故）为医院政委。李宽和同志调任兴山市市长，不兼医大工作。自从两校合并后，教职学员人数逐渐增多，加上前方又转来大批伤病员到医大附属医院治疗，住房就十分紧张了。我们将鹤岗矿务局所空着的全部房屋都修理好，才勉强够住。合校后不久，王斌校长要我筹办医大印刷厂，准备将过去用的油印讲义全部改为铅印教材。我为此多次前往佳木斯联系印刷机。当时莲江口通佳木斯的铁路桥（鹤岗至佳木斯必经之路）被日军破坏后尚未修复，来往都要从桥梁枕木上爬过，时逢深秋，松花江上风大流急，枕木微微晃动，使人触目惊心。况且当时从莲江口通往鹤岗只有运煤车，不通客车，我们来往只有挤在煤车最后的守车上，才免于受冻。十月间我又去佳木斯时，因马车翻车，不幸砸伤右脚内踝，被打上石膏，行走不便，只得卧床休息。但在此期间，崔秀汉同志每天按时到我家商量工作，所以工作并未停止。这年冬天我军北线部队退守松花江以北

地区，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土改后，大批青年农民踊跃参军，我军充实了新生力量，加强了练兵，准备明年春季的大反攻。当时后方还有少数残余的政治土匪尚未肃清。在我卧病期间，鹤岗以北有小股土匪扬言要攻打鹤岗，我们昼夜处于战备状态。一九四七年二月，我离开鹤岗到哈尔滨治病。后来总卫生部分配我在哈尔滨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在哈尔滨任中国医大第二分校校长时，曾因参加中国医大教学经验交流会而回鹤岗住了一个星期。同年十一月，我又奉命去沈阳接管南满医科大学（当时叫沈阳医学院），从此再未回过鹤岗。

我四十年前在鹤岗先后虽只有短暂的八、九个月，但鹤岗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鹤岗是中国医大在东北的第一个落脚点，没有鹤岗市（原兴山市）和矿务局的大力支持，医大是不可能三年内为我军培养出数百名毕业生到解放战争前线去服务的。这些同志不仅在解放战争中，而且在以后的抗美援朝及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除少数不幸牺牲者外，他们今天分布在全国各省市，都是卫生界的骨干力量。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中共鹤岗市委、鹤岗市政府、鹤岗矿务局的领导和鹤岗市的全休人民对中国医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忆打断传染环境卫生战略

——消灭东北鼠疫大流行的卫生公务

王 斌

东北西满三角的鼠疫是世界闻名的。历史上伍连德没有消灭它。日伪统治东北时期没有消灭它。每年小流行，三年大流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损失。日伪错误认为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投降，党中央、毛主席要中央所属的几个高等干部学校开赴东北解放区，左大成同志带领中央党校，何长工同志带领抗大，王斌带领中国医科大学，周扬同志带领鲁迅艺术学院。当时我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政委。我们从延安出发，经过张家口、多伦到达齐齐哈尔、哈尔滨。因为蒋介石在日本快投降的时候，就忘恩负义，撕毁统一战线协议，向各解放区进攻，所以我们只能绕道去东北。

一九四六年冬中国医科大学到哈尔滨后，找不到适当校舍，只好迁驻合江省兴山市（现黑龙江省鹤岗市）。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使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此，在兴山市时坚决执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是有成份，但不能惟成份，重在政治表现。”“成份不能由人选择，但革命道路是由人可以选择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革命的动力。”特别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争取和团结日伪政权垮台留下来的伪满的所有医生、护士，对日本人、中国人一视同仁。许多伪满的日本教授回国后还常怀念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常来东北旧地重游，对我国派到日本的留学医学生也十分关怀爱护，力图报效。

一九四六年冬和一九四七年春，西满三角的鼠疫大流行，中国医科大学刚到东北合江省兴山市尚未休息过来。西满三角内已死几万人！交通梗阻，生产停滞。真是“一村一镇人烟灭，万户萧疏鬼唱歌。”人们谈鼠变色。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从平津出关，占领了锦州、营口、沈阳、长春，并向哈尔滨逼近。

背后是鼠疫，前面是反革命军，背腹受敌，我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危在旦夕！当时东北负责人林彪同我和贺诚面谈，共商对策。我说许多民族被传染病灭亡，许多战争也因传染病流行而失败，这种例子在世界历史上很多！鼠疫是一号传染病，要消灭鼠疫，巩固后方，实非易事。因为日伪多年来一直没有消灭鼠疫。

当时我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政委，贺诚同志任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我们二人共事半个多世纪，责任艰巨。

我在兴山中国医大办公室找阎德润教授谈话，他曾任伪满洲国厚生省长即卫生部部长。我问他日伪消灭鼠疫有何良策。阎教授告知：“每年小流行，三年大流行，已成为客观的规律，无法改变。”“消灭鼠疫好办吗！用机枪将村、镇包围，然后喷上汽油，用火焚烧，人畜房屋同化为灰烬即可。”这样同归于尽的办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采用，因为没有人道主义，会脱离群众。我又问阎德润教授：

“你当厚生省省长干些什么？”他说：“我们工作主要是戒大烟和治疗花柳病。”这些社会病在新社会早已绝迹。

情况十分危急，到底怎么办？没人出主意，书上也查不到，真急得我没办法！

苏联来了两个防疫队，无济于事。

若按照老办法，就得开办鼠疫大专班，从鼠疫细菌学、媒介动物学、肺鼠疫、腺鼠疫、皮肤鼠疫……一一系统讲授和实验、实习，得用两三年时间，这样是正规，不免有点教条主义，脱离当时的危急情况，不许可这样办。

只好以深入浅出的办法，提出打断传染环的卫生战略，把我手上的卫生兵种中国医科大学教职学员代表召集起来开会，只用短时间讲清楚打断传染环的卫生战略。这样捕鼠灭蚤，隔离治疗已病患者，中国医大的全体教职学员一齐深入疫区，并动员和组织西满三角的人民一齐干，很快将鼠疫消灭，恢复了交通和生产。我军无后顾之忧，相继解放锦州、营口、沈阳、长春，然后挥戈南下，解放天津，奠定国基。

然后在长春办一个鼠疫研究所，现在白城市全面发展鼠疫科学，使许多同志成为了理论和实践一致的鼠疫专家，他们对鼠疫的发生发展规律了如指掌。能掌握消灭鼠疫的卫生战略，这是可贵的。

预防为主，普及卫生防疫网，在西满三角新建六十个鼠疫防治卫生院，永钉鼠疫难翻身，至今已四十来年未小流行、大流行了，使人民安居乐业。

但不能高枕无忧，应居安思危！因自然疫源尚存，苏修、美帝仍在搞生物战。

解放战争中的鹤岗

煤矿运输工人

张 钺

祖 国 光 复 啦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早晨七点多钟，正是工人们上班的时间，我走到发电厂炉灰堆附近，猛听到嗡嗡的响声。抬头一看，上空有两架飞机冒着白烟在鹤岗上空转了两圈，向西南方向飞去。同时又听到“电啐”（警报）声直响，按往常习惯认为：“又是防空演习吧！”这时，来往上班的工人们，三三两两的小声嘀咕着：“那两架飞机飞得那么高，可能是苏联的吧？！日本人都没上班，是不是发生了战争？”当时我也知道德国鬼子已于五月间无条件投降，估计日军也长不了啦。光复前老百姓既没有收音机，也看不到报纸，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条幅，所以消息很闭塞。我到班上一看，管事的日本人一个也没来。见到几名工友，大家一合计，一定是有说头儿，咱们也走吧。当天晚上就听到社宅（现在的红军街，原日本人住宅区）的日本人男男女女的鬼哭狼嚎之声，收拾东西溃逃了。

十日晚上，大约九、十点钟，我正要睡觉，就听到“轰轰”的两声，弄不清是手榴弹声还是大炮声，屋里的窗玻璃被震得“喇喇”直响，有的被震碎。人们吓坏啦，也不知往哪里躲好，没办法只好不出屋吧。后来才知道那是苏军向煤

矿办公大楼打来的炮，把兴山采炭所办公室的东墙打了个大窟窿。

十三日清晨，正下着蒙蒙小雨，就听说苏联红军打进来了，左邻右舍不约而同的到大道上迎接苏军。苏军的武器装备比日本人可强多啦，都是轮盘枪，战士们也威武雄壮。后来听说他们是先遣部队，路过鹤岗又往南进军追击日军，在鹤岗只留下部分驻军维持治安。这时，人们才知道祖国光复啦，日本鬼子彻底垮台啦！

运输动力的恢复

八月十五日这天，工人们相继来到工作地点——机关库（即存放和检修机车、电车的场所，解放后改称机务段）。大家一看，所有能运转的机车和电车都被日本开跑了，只剩下多年破损失修的4508、1013两台电车和老8号一台机车。这时听说发电厂也被破坏了，有一些工人正在抢修发电设备。我们机关库这些工人便七嘴八舌地说，咱们也得把电车检修一下，修好了好给发电厂送煤。这时，张凤相、王洪斌、张吉祥、刘兰庆等修车工人便着手修理4508号电车。经过紧张地修理，通过试运，便能运转啦。这时，魏荣耀从发电厂来到机关库（魏光复前是矿山机电修理的老技工，工人们称他魏头）。他把发电厂设备即将修好的消息告诉给我们，并和我们商量说：“你们修好电车后给发电厂送两车煤，好让他们点炉发电。当时工人们非常着急，如果发电厂不能发电，大家都没有水吃，老衙基地区上万人只靠那仅有的两眼土井是维持不了生活的。所以工人们团结协作，积极抢修，大家兴奋地说：“这回可不受日本人气啦，不给钱也得干三年。”我记得当时电车司机没在场，电车修理工

吉张祥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开车。就这样，十五日的下午给发电厂送去了两车煤，大约十七、八号发电厂便发了电。大坝、水源地有了电，便开始供水。

十六日上午运输系统各工种的工人们纷纷聚集到机关库，互相探问：“你咋来啦？”工人们不约而同的回答：

“我听见电车叫唤啦（电车笛响）还能不来吗！？”这时机车修理工人和司机、司炉还有调车、连结的工人们都在议论：“把机车也修好，咱们好干活呀。”于是，机车修理工人穆云青、任子安、王文福、侯云甲等便着手修理破损多年的老8号机车。接着，铁铆工人李少儒、陈乐刚、毕树美等也参加了修复工作。虽然这台机车破损程度较大，但经工人们的努力，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修复点火啦，通过水压试运使用良好。这在光复前给日本人干活就是用两个月时间都不能修好的。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电车、机车都修复运转啦，工人们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他们主动到班上值班、出乘、看管器材设备，使惨遭日军破坏处于停滞状态的矿山动脉——运输系统得到了新生！

苏联红军进驻机关库

我记得是八月二十日，苏联红军派五名士兵进驻了机关库。其中一名少士、四名小兵。苏军所以进驻机关库，是因听到了汽笛声。当时工人们高兴地喊着：“火车叫唤啦！”火车头叫唤，意味着运输工人们有了希望，有工作干啦！

苏军进驻机关库后，便直接指挥机车出乘，他们说苏军运，强制出车，每天或隔日往莲江口运进一次物资，这样持续了几个月。

政府接管煤矿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部派来接管矿山的王其清同志组织成立鹤岗矿务局，解散了当时的维持会，矿务局下设若干科室。沿袭了旧机构，将机关库划分为机车、电车、机务、材料四个股，分别负责机车、电车的修理和司机、司炉、乘务、值班等工作，隶属机械科领导。将各车站（包括鹤岗至莲江口各车站）及乘务员划归运输科领导。从此煤矿运输工作初步建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正常秩序，为恢复煤矿生产，保障矿区人民生活物资的运送起到了推动作用。

运输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战争

矿务局的成立，使矿区的工人们有了依靠，有了希望！运输工人在矿务局的领导下，一马当先，积极地恢复机车、电车、货车及铁路、线路等运输设备。并健全组织，回收工具、器材，为运输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这时，工人们已几个月没有收入，生活必需的粮米油盐发生了困难。工人们除投亲靠友互相帮助外，有的把自家暂时不用的物品卖掉换点粮食糊口，有的到农村（鹤立、莲江口一带）去背回粮食度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运输工人们仍然坚守岗位，该顶班的顶班，该出乘的出乘，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咱们不受日本人气啦，不给钱也得干。”这就保证了发电厂所需的煤炭及各矿井恢复所需的器材的运输，使整个矿区居民得以用电用水，稳定了人民的情绪，加快了矿井恢复生产的速度。

工人们忘我的劳动使运输动力不断增加。日本人溃逃时

遗弃在莲江口大桥上的两台大型机车650、651号（其中650号被苏军炮击破损），在运输和修车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于一九四五年末拉回鹤岗，经短时期修理后又投入使用。运输动力的增加，提高了运输能力。当时国铁尚未修复，在矿务局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我们开始了贮煤外运工作。当时矿区贮煤约三十万吨。

贮煤外运是解放战争的急需，同时又能把外地的粮食运回鹤岗以解决缺粮之难。运输工人们在既不发工资，又不供给粮食的情况下，毫无怨言，积极主动地完成各自分担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年初，中断了几个月的煤炭外运工作又恢复了。鹤岗原煤源源不断的运往莲江口、绥化、北安、齐齐哈尔、哈尔滨等沿线各地，既解决了铁路机车支前运输用煤的需要（当时铁路机车因缺煤，时常烧黄豆应急），又从外地运回了粮食。从此工人们开始每天发给四斤半粮食和少量的出差菜金。

一九四六年，因时局的变化，鹤岗已成为解放战争的基地，支援前线的后方。这时运输工人肩负的担子就更重了，既要负责矿内运输，又要负责煤炭外运。在这一年里，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矿务局的主要领导和组织机构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首任局长王其清奉命调走。第二任局长李天放任职不到半年也调走。第三任局长闵一帆于八月末到鹤任职工作，十一月末国铁西满铁路局成立后（西满铁路局设在齐齐哈尔），接管了鹤岗至莲江口的各站、段及长途运输业务。从此矿区运输部门卸掉了煤炭外运的任务，专事矿区运输工作。

由于矿务局的领导不断加强，组织机构的逐步完善，使得各矿井的恢复工作进展很快，煤炭产量不断提高。但由于

动力不足，运输工作紧张而又被动，难以承受繁重的任务。工人们提议，把日本人溃逃时开走的电车找回来。我当时任运输科副科长，便把这建议反映给闵一帆局长。闵局长说：这条建议很好，我给你写封信，你马上去找铁路军代表李荫芝同志，请他协助把电车运回来。经打听得知，日本人开着电车逃到林口时，被苏军堵截，便将车扔在林口投降啦。我找到军代表李荫芝后，他给我开了去林口机务段的介绍信。我立即去林口。一到机务段，便看到一排电车停留在段管线上。经打听段长是陈占武，我高兴极啦！陈原是佳木斯机务段火车司机，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过两年。到办公室我一眼就看到了陈占武，由于离别几年重新相遇，这就更显得格外亲切。我们唠了一会儿，我便把介绍信交给了陈段长，说：找你要电车来啦。陈说：这电车是你们的？快拉走吧，我们这里正没有地方摆呢。这样很顺利地就商量妥啦。

我在林口住了两宿，对电车进行了一番检查。机车很多零、部件及附属品被拆掉和砸碎，但主要机电设备没有损坏，经过修配是能够使用的。心中有数了，我急忙从林口经牡丹江、哈尔滨绕道返回鹤岗（当时因战争莲江口江桥被破坏，南道不通车）。到鹤岗后，立即安排了佟佩华、刘兰庆、胡中全等四名工友，携带必要的工具、油脂去林口取电车。当时铁路运输还很不正常，除支前的军用列车外，其它列车都难以保证时间。他们经多方联系，铁路各站段（当时各站段都是军代表说了算）才同意将电车运回鹤岗。一路上他们是风餐露宿，日以继夜地守在电车里。每到一个编组站，一等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在严寒的冬天，他们吃不到热饭，喝不到开水。不得已，后来他们买了一个小铁炉子。经过十几天的时间四台电机车终于运回了鹤岗。

强化领导，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

一九四六年，从老革命根据地——延安调来了一批老干部（如田力夫、丁明、赵忠、杨直功、刘振英等），加强了整个矿务局的领导，特别是加强了运输工作的领导，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较大调整。丁明任运输科行政主任（即党政一把手），刘振英、刘景义和我任副科长。当时矿区职工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比较复杂；为巩固和发展鹤岗矿区的政治经济形势组成了以老干部为核心的若干个工作组，从运输系统抽调很多有觉悟的工人（如王洪斌、陈维亚、苏凤岐等）参加了工作组。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摸底，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整个矿区进行了一次人员清理。对一些政治上不坚定（动摇分子）、工作上不踏实、历史上有民愤的人进行了清洗。同时精简了组织机构。运输科和工务科合并为工电科，下设若干厂、段、队。丁明任科长、王绍武、何荣昌任副科长，我任机务段长。机构的精简和闲乱杂人的清洗，给工作带来了生气。在革命老干部的教育和影响下，工人们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当时我们每天都学习工人课本，内容如谁养活谁，什么是剥削等），工作起来就更起劲了。

行动起来大战红五月

一九四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工会主持下，召开了庆祝大会，工人们扛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的标语牌，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参加游行。

翌日上班后，修车工人张吉祥、刘兰庆、孙克勤等提出，要想尽办法把1013号电车修好，向红五月献礼。1013

号电车是德制西门子型，在技术装配方面非常复杂。过去都是日本人掌握图纸，根本不让中国人看。所以要修复这台电车是很困难的。但工人们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下，积极响应大战红五月的号召，毫不气馁，并豪迈地说：“人家能造出来，咱就不能修好吗？一定把它修好！”在修复过程中，张吉祥同志曾把手臂烧伤，个别人产生了畏难情绪。张吉祥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又投入修复工作。他与孙克勤、胡中全、万长海、赵学千等人精心钻研、密切配合，多方面找资料、搞试验，终于掌握了复杂的技术，修复了1013号电车，给运输工作增添了动力，为大战红五月，增产煤炭做出了贡献。

在大战红五月中，广大煤矿工人积极投入了“增产煤炭，支援前线”的战斗。如南山矿以孙好清为首的采煤工人们，在当时缺少弹药的情况下，用手刨镐每人每班生产十八吨煤。这在现在来说也是高效率的。全局煤炭产量由过去日产不到千吨，猛增到日产两千吨以上。这就给运输工作带来了繁重的任务，不仅要保证煤炭生产车皮的及时供应，还要随时把坑木器材送到矿井。这在当时机、电车动力少、质量又差的情况下，对广大运输工人是个严峻的考验，但广大运输工人们竭尽全力，密切配合，终于胜利的完成了各项任务。七月初矿务局在老君堂广场（现六中院内）召开的庆功大会（也是打擂台比武会）上，很多运输工人受到表扬，王益芝、周海春、张吉祥等还被评为劳模，同时由于老8号机车出了很大力，故命名为“五·一”劳动号。这给运输工作增添了光彩。